

關於中國的早期新石器文化

安志敏

一、引言

中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國之一，有着獨立的文化起源和發展。它在繁榮發達的新石器文化的基礎上，終於在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首先建立了階級國家，開始出現城市以及相當發達的青銅器和文字，燦爛的商代文明為中國歷史譜寫了新的篇章。

新石器時代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從這個時期起，人類不再似舊石器時代或中石器時代那樣，以採集漁獵作為經濟生活的主要手段，而是發明了農耕和畜牧，以人工生產控制了食物的來源，這在人類經濟生活中是一項巨大的變革，從而產生了「新石器革命」的說法¹。由於經濟上的變革和發展，才為後來的文明誕生創造了先決的條件。因此，在探討中國文明起源的同時，還必須聯繫新石器時代的產生發展過程，才能得到比較圓滿的解答。

關於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研究，是伴隨着現代考古學而出現的，迄今不過六十多年的歷史，特別是1949年以後三十多年的成績尤為顯著。早在本世紀的初葉，由於缺乏考古學資料的見證，曾出現所謂中國無石器時代的說法²。從二十年代起，隨着以彩陶為特徵的仰韶文化的發現³，開始得到確認。不久，由於以黑陶為特徵的龍山文化的發現⁴，以及以河南安陽後崗為代表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商代的三疊層的存在⁵，使史前時期和歷史時期的銜接更加密切。自1949年以來，在廣泛的發現和大規模考古工作的基礎上，對於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地理分佈、文化特徵、類型分期和年代序列，基本上都

1 V. G. Childe,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1954.

2 B. Laufer, *Jade—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pp. 54—55, 1912;
J. de Morgan, *Prehistoric Man*, p. 239, 1924.

3 安特生：〈中華遠古之文化〉，《地質彙報》5號1冊，頁1—46，1923年。

4 李濟等：《城子崖》，頁1—105，1934年。

5 梁思永：〈小屯龍山與仰韶〉，《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頁555—567，1935年。

獲得解決。特別是河南龍山文化導源於仰韶文化，而以二里頭為代表的早商遺存又與河南龍山文化密切相關，它們之間一脈相承的淵源發展，已成為確鑿無疑的歷史事實。隨着碳-14 測定年代方法的應用，仰韶文化的絕對年代已提早到公元前三、四千年以前，過去被作為新石器時代晚期或金石並用期等說法，已徹底被否定了。那麼，仰韶文化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一直模糊不清。七十年代以來，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和大地灣文化的發現，為探索早期新石器文化取得了突破，對於解決仰韶文化的起源，以及論證中國新石器文化的繼承發展規律等，都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中原地區之外的許多考古發現，也一再更新了我們的認識：如細石器傳統的產生、發展，及其在北方草原地區的廣泛分佈，都帶來新的研究課題；華南地區以繩紋陶為代表的遺存，也表現了濃厚的地域色彩；最近在長江中游也出現新的苗頭。這些迹象充分表明，全國範圍內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可能有着不同的來源，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由於相互交流和影響，逐漸出現融合統一的趨勢，並為古代文明的出現奠定了基礎。根據現有的考古資料和認識，試圖對主要的遺存分別進行綜合介紹。

二、中原的遺存

中原地區早期新石器文化的探索，一直為中國考古學界所關注。1976年發現的河北武安磁山遺址⁶和1977年發現的河南新鄭裴李崗遺址⁷，在文化性質上具有一定的共性，又有相當大的差異，關於文化系統和命名方面，還存在各式各樣的意見。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主張兩者屬於同一個文化系統，稱其為磁山文化⁸或裴李崗文化⁹，也有人統稱它為磁山·裴李崗文化¹⁰或者進一步分為磁山、裴李崗兩個類型¹¹。(二)主張

6 邯鄲市文物保管所等：〈河北磁山新石器遺址試掘〉，《考古》1期，頁361—372，1977年；河北省文物管理處等：〈河北武安磁山遺址〉，《考古學報》3期，頁303—3386，1981年。

7 開封地區文管會等：〈河南新鄭裴李崗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2期，頁73—79，1978年；開封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等：〈裴李崗遺址一九七八年發掘簡報〉，《考古》3期，頁197—205，197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隊：〈1979年裴李崗遺址發掘簡報〉，《考古》4期，頁337—340，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隊：〈1979年裴李崗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期，頁23—51，1984年。

8 嚴文明：〈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新發現〉，《考古》1期，頁46，1979年；唐雲明：〈略論「磁山」和「裴李崗」的有關問題〉，《考古與文物》1期，頁58，1981年。

9 李友謀：〈略論裴李崗文化〉，《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期，頁64—69，1978年。

10 夏鼐：〈三十年來的中國考古學〉，《考古》1期，頁387，1979年。

11 李紹連：〈關於磁山·裴李崗文化的幾個類型——從荻溝北崗遺址談起〉，《文物》5期，頁24—26，1980年。

兩者屬於同一時期的不同文化，分別稱它們為磁山文化和裴李崗文化¹²。

在討論上述發現之際，又將五十年代發現的陝西渭南老官台遺址¹³和西鄉李家村遺址¹⁴重新命名為老官台文化¹⁵和李家村文化。¹⁶關於老官台文化的性質和命名也有不同的意見：(一)以老官台為代表的遺存早於仰韶文化，可稱為老官台文化。後來又有人以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¹⁷和老官台遺址分別代表早晚的兩個類型¹⁸。(二)以老官台為代表的遺存，與陝西寶鷄北首嶺下層相同¹⁹，屬於仰韶文化的早期²⁰。以大地灣一期為代表的遺存，應稱為大地灣文化²¹。

以上的文化命名和內涵的認識，由於各家的理解不同，概念互異，在應用上也造成一定的混亂。我曾建議歸納為三種文化，基本上反映了地理分佈及其文化內涵上的特點：(一)裴李崗文化以河南中部為中心，大體是沿着黃土高原的邊緣和太行山脈的東麓，南自淮河，北至漳河之濱的狹長地帶，共發現四十處遺址。(二)磁山文化，主要分佈在河北的南部，沿太行山的東麓，南自漳河北達易水，處於華北平原西部的狹長地帶，共發現五處遺址。(三)大地灣文化，分佈在黃土高原的渭河流域，個別遺址穿過秦嶺，到達丹江上游，共發現七處遺址²²。(圖一)至於李家村文化主要分佈在秦嶺以南

12 安志敏：〈裴李崗、磁山和仰韶——試論中原新石器文化的淵源和發展〉，《考古》4期，頁340，1979年。

13 北京大學考古教研室華縣報告編寫組：〈華縣、渭南古代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學報》3期，頁297—302，1980年，圖二、三。

14 陝西分院考古研究所：〈陝西西鄉李家村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7期，頁352—354，1961年；陝西省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水隊：〈陝西西鄉李家村新石器時代遺址一九六一年發掘簡報〉，《考古》6期，頁290—291、295，1962年。

15 同注8A，頁48—49；張忠培：〈關於老官台文化的幾個問題〉，《社會科學戰綫》2期，頁224—231，1981年。

16 魏京武：〈李家村新石器時代遺址的性質及文化命名問題〉，《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頁14—22，1980年。

17 甘肅省博物館等：〈甘肅秦安大地灣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存〉，《文物》4期，頁1—7，1981年；甘肅省博物館等：〈一九八〇年秦安大地灣一期文化遺存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期，頁1—4，1982年；甘肅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1978—1982年發掘的主要收穫〉，《文物》11期，頁21—22，1983年。

18 張朋川等：〈試談大地灣一期和其它類型文化的關係〉，《文物》4期，頁11—12，1981年；張瑞嶺：〈渭水流域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存的文化性質與年代〉，《考古與文物》4期，頁71—74，1982年。

1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寶鷄工作隊：〈一九七七年寶鷄北首嶺遺址發掘簡報〉，《考古》2期，頁97—106、118，1979年。

20 同注12，頁341—342。

21 安志敏：〈關於裴李崗文化的性質和年代〉，《社會科學戰綫》1期，頁206，1982年。

22 安志敏：〈略論華北的早期新石器文化〉，《考古》10期，頁937—938，1984年。

的漢江上游²³，與大地灣文化有明顯的區別，據最近的兩項碳-14數據為公元前四千年左右²⁴，與仰韶文化早期相當，可不列入早期新石器文化的範疇。

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和大地灣文化的三種遺存，具有一定的共性，表明它們的時代特徵和交流影響。為了便於說明，採取綜合介紹的方式，並指出它們之間的異同。

遺址分佈在中小河流的沿岸，面積都在一萬平方米以上，發現房址、窖穴和墓葬等遺迹，表明當時已形成相當穩固的定居聚落。聚落的佈局還不大清楚，有圓形或方形的半地穴式房屋，門前有着狹窄的門道，是一種簡陋的木構建築。灰坑多作圓形，一般小而淺，磁山遺址的長方形灰坑深達五米，多係貯藏用的窖穴。墓葬以裴李崗遺址最為典型，已發現一百多座墓葬在聚落附近集中葬埋形成氏族墓地。葬式以單人葬為主，也出現個別的雙人葬，大都有陶器和石器隨葬。其中的石磨盤、石磨棒和石鏟、石鐮代表兩套隨葬品，它們決不共存，只有合葬墓才配備了兩套，可能反映墓主人的性別不同，可惜由於人骨腐朽而無從鑒定。磁山文化和大地灣文化也有零星墓葬的發現，但分佈不集中，隨葬品的種類也不像裴李崗文化那樣突出。

農業經濟的色彩相當濃厚，如磨製精緻的帶足石磨盤、圓柱形石磨棒，狹長扁薄的雙弧刃石鏟以及帶鋸齒刃的石鐮等，（圖二）為裴李崗文化和磁山文化的典型農具。不過磁山文化磨製得比較粗糙，石鐮較少，也不附鋸齒刃。大地灣文化的石鏟、石刀也比較粗糙，還出現個別的蚌刀和帶鋸齒刃的蚌鐮，代表着另外一套農具。農作物的種類比較明確，磁山遺址的窖穴里出土成堆的腐朽粟粒（*Setaria italica*），大地灣遺址發現黍（*Panicum miliaceum*）和油菜（*Brassica*）的殘骸，證實以粟、黍為代表的耐旱作物，因適於黃土地帶栽培，從較早的時期起就成為華北農業的主要作物。裴李崗遺址出土豬骨和栩栩如生的豬頭陶塑；磁山遺址發現大量豬、狗骨骼，甚至還有家鷄的存在²⁵；大地灣遺址出現以豬下頷骨隨葬的現象，反映當時的家畜以豬、狗為主。此外，在一些遺址裏還發現胡桃（*Juglans regia*）、朴樹子（*Celtis bungeana*）、榛子（*Corylius heterophylla*）以及魚骨和獸骨等，表明採集漁獵經濟仍佔一定的比例。

這個時期的石制工具，除裴李崗文化以磨制為主並加工得相當精緻以外，磁山文化和大地灣文化都以打製石器佔絕對優勢，有砍砸器、刮削器和斧形器等，磨製石器也相對地要粗糙一些。值得注意的是，裴李崗文化和大地灣文化都出土細石葉和加工精緻的刮削器，表明細石器傳統的工藝仍有殘餘。

23 魏京武：〈李家村·老官台·裴李崗——關於黃河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幾個問題〉，《考古與文物》4期，頁70，1981年。

2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實驗室：〈放射性碳素測定年代報告（一二）〉，《考古》7期，頁656，1985年。

25 周本雄：〈河北武安磁山遺址的動物骨骸〉，《考古學報》3期，頁343—346，1981年。

陶器比較原始，手製，胎壁厚薄不勻，燒成溫度稍低於仰韶文化，裴李崗文化為900~960℃，磁山文化為700~930℃。裴李崗遺址發現的橫穴式陶窑，也與仰韶文化相似，表明制陶工藝已有一定的基礎。至於陶器的器形、陶質和紋飾，三個文化有着一定的共性但也各有自己的特點，例如以圓底鉢、三足鉢和敞口深腹罐為代表的器形三者基本一致。各自特有的器形如下：裴李崗文化以半月形雙耳圓底壺、鼎為代表，磁山文化以敞口直壁的盂和倒置靴形支架為代表，雙耳壺為細頸平底，也不同于裴李崗文化；大地灣文化以敞口深腹三足罐和小口圓底壺為代表，圓底鉢下附加圈足的也比較常見。據陶質觀察，裴李崗文化和磁山文化均以夾砂粗紅陶為主，也有一定數量的泥質紅陶；大地灣文化則以夾細砂的粗紅陶為主，罕見泥質紅陶。陶器表面的加工和紋飾，在各個文化之間出現了顯著的差別：如裴李崗文化以素面為主，泥質陶大部經過磨光，精緻的與仰韶文化相媲美，河南臨汝中山寨發現一片花紋簡單的黑彩彩陶，也有少數的篋紋、劃紋和乳釘紋等；磁山文化的陶器也以素面為主，不過繩紋大量出現，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一，也有少量的篋紋、劃紋和乳釘紋等，還發現一片紅彩的複合曲折紋彩陶；大地灣文化以呈方格狀的交錯繩紋最為普遍，僅圓底壺等少數器物呈素面，三足鉢的口部多將繩紋抹平磨光，施以帶狀紅彩，有的內表面也加繪複合曲折紋的紅彩。從陶器所反映的特徵來看，三者之間區別大於共性，(圖三)也證明它們屬於不同的文化系統。

根據地層疊壓關係和碳-14斷代，證實這些發現屬於較早的遺存。例如河南長葛石固遺址²⁶、臨汝中山寨遺址的裴李崗文化層²⁷以及大地灣遺址²⁸、陝西渭南北劉遺址²⁹的大地灣文化層，都被疊壓在仰韶文化層之下。碳-14斷代也提供了更明確的證據，如裴李崗文化共測定十六個數據，摒除三個誤差較大的數據以後，年代約為公元前5500~4900年(半衰期為5730年，下同)；磁山文化的三個數據為公元前5400~5100年；大地灣文化的十一個數據摒除一個誤差較大的數據外，約為公元前5200~4500年。以上的碳-14數據都早於仰韶文化(公元前4500—2500年)，也反映以上三種文化大體處於同一時代。(圖四)

從文化性質上觀察，它們同仰韶文化的早期階段有着更密切的聯系，如聚落的分佈、房址、窑址的形製、墓地的結構以及生產經濟方面，都有一定的相似性，特別是石器和陶器等文化遺物表現着明顯的繼承關係。這些都有力地證明，它們屬於仰韶文化的先驅。

26 長葛縣文化館：〈長葛縣裴李崗文化遺址調查簡報〉，《中原文物》1期，頁37，1982年。

27 臨汝縣汝瓷博物館：〈臨汝縣裴李崗文化遺址調查簡報〉，《中原文物》4期，頁1—2，1985年。

28 同注17。

29 西安半坡博物館等：〈渭南北劉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調查與試掘簡報〉，《考古與文物》4期，頁1—10，1982年。

三、細石器傳統的發展

以細石器為代表的細石器傳統，是在華北晚期舊石器的基礎上產生的，典型的遺存在陝西大荔沙苑³⁰、河南許昌靈井³¹、山西沁水下川³²、襄汾柴寺、蒲縣薛關³³、河北陽原虎頭梁³⁴、山東臨沂鳳凰嶺³⁵和江蘇東海大賢莊³⁶等地都有發現，不見陶器，也缺乏共生的動物化石，在斷代上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見，一般作為晚期舊石器的末葉或中石器來對待。有些碳-14數據顯得偏早，可能與樣品的採集不當有關，不過像薛關和虎頭梁遺址分別為公元前11600±150年和9059±500年，已接近中石器的時代。特別是下川、薛關等遺址，除典型細石器之外，還出現打製的鏟形器和研磨盤等進步的形制，表明它們很可能晚於舊石器時代。根據目前的考古資料大體可以推定，典型細石器出現於舊石器的末葉，而盛行於中石器時代，華北一帶可能是細石器的起源中心。不過到了新石器時代，華北的細石器傳統開始絕迹，但在東北、內蒙古和新疆等草原地帶繼續盛行，甚至延續到歷史時期。

草原地帶較早的細石器傳統，大體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遺存以採集漁獵經濟為主，過着流動的營地生活，一般遺址不大，缺乏明顯的文化堆積，可以新疆哈密七角井³⁷、西藏申扎雙湖³⁸、青海貴南拉乙亥³⁹和內蒙古海拉爾松山⁴⁰為代表。它們的共同特徵是，具有豐富的細石器，也偶有大型的打製石器，但不見磨製石器或陶器共存。這

30 安志敏、吳汝祚：〈陝西朝邑大荔沙苑地區的石器時代遺存〉，《考古學報》3期，頁1—12，1957年。

31 周國興：〈河南許昌靈井的石器時代遺存〉，《考古》2期，頁91—98，1974年。

32 王建等：〈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遺址調查報告〉，《考古學報》3期，頁259—288，1978年。

33 王向前等：〈山西蒲縣薛關細石器〉，《人類學學報》2卷2期，頁162—171，1983年。

34 蓋培、衛奇：〈虎頭梁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的發現〉，《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5卷4期，頁287—300，1977年。

35 臨沂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山東臨沂縣鳳凰嶺發現細石器〉，《考古》5期，頁385—388，1983年。

36 南京博物館：〈江蘇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頁198，1979年。

37. Teilhard de Chardin & C. C. Young, "On Neolithic (and Possibly Palaeolithic) Finds in Mongolia, Sinkiang and West China",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Vol. XII, No. 1, pp.94—95, 1932.

38 安志敏等：〈藏北申扎、雙湖的舊石器和細石器〉，《考古》6期，頁481—491，1979年。

39 蓋培、王國道：〈黃河上游拉乙亥中石器時代遺址〉，《人類學學報》2卷1期，頁49—59，1983年。

40 安志敏：〈海拉爾的中石器遺存——兼論細石器的起源和傳統〉，《考古學報》3期，頁289—316，1978年。

些遺存從經濟形態上看也可歸入中石器的範疇，不過有的年代却比較晚，如拉乙亥遺址的碳-14斷代為公元前4795±85年，略晚於裴李崗文化，可能反映當中原地區出現農業之後，細石器傳統的某些地區依然過着採集漁獵的經濟生活。

第二類遺存，在以農業經濟為主的定居聚落中，保留着一定的細石器傳統，多分佈在內蒙東部和遼西一帶，如新樂文化、紅山文化和富河文化等都是典型的代表，不過它們的年代稍晚，大體和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相當。最近在內蒙放漢旗發現的興隆窪文化，對於細石器傳統中的早期農耕文化，又增加了新的認識⁴¹。興隆窪遺址呈圓形的聚落，周圍有壕溝環繞，從地面的灰堆可以看出成排的**房屋**達百餘間，都是半地穴式房址。這裏的聚落佈局和房屋結構同仰韶文化類似。使用的石器以打製為主，有鏟、鋤、砍砸器等，磨制的也大量存在，有磨盤、磨棒、斧、鐮等。至於細石器的數量不多，僅有細石葉和個別的細石核，有的骨鏢上還嵌有細石葉，表明它是一種漁獵工具（圖五）。陶器的特徵較為明顯，陶質粗糙，火候較低，器形以筒形罐佔絕大多數，表面飾以刻劃壓印的交叉紋、網狀紋、之字紋和坑點紋等，原則上屬於篋紋陶的系統（圖六）。從定居聚落和生產工具上，可以看出這裏是以農業經濟為主，不過採集漁獵仍佔較大的比例。興隆窪遺址的上面疊壓有紅山文化的灰坑，所測定四個碳-14數據，為公元前5500—4900年，與中原地區裴李崗文化等年代大體相當。

由於農業經濟的發展，興隆窪文化的細石器傳統開始減弱，以篋紋陶為代表的特徵，也表現了濃厚的地區色彩，它不僅與中原的篋紋陶有聯系，在東北一帶也有廣泛的影響。

四、華南的發現

遼闊的華南地區，以打製石器和繩紋陶為代表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在江西、廣西、廣東、福建和台灣一帶都有所分佈，包括洞穴、貝丘和台地三類遺址，可能屬於幾個不同的文化系統。⁴²

它們的共同特徵比較一致。生產工具中以打製石器佔絕大的比例，有砍砸器、刮削器和盤狀器等，磨製石器比較少見，以有孔石器、斧、鐮等為代表（圖七）。陶器全部為夾砂粗紅陶，顏色不純，火候較低，如廣西桂林甌皮岩和廣東英德青塘的陶片，燒成溫度只有680℃，可能還沒有使用陶窑。紋飾以繩紋為主，也有劃紋、籃紋和篋點紋等，至

4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內蒙古放漢旗興隆窪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0期，頁865—874，1985年。

42 安志敏：〈關於華南早期新石器的幾個問題〉，《文物集刊》，3期，頁98—106，1981年。

於陶面塗朱或加陶衣的可能時代稍晚（圖八）。陶器的數量一般較少，並且相當破碎，很少能復原成完整的器形。

當時的人類以採集漁獵經濟作為生活的主要手段，如洞穴遺址內有成堆的螺壳，貝丘遺址也是由淡水或海產的貝壳所構成，同時還有漁獵工具和野生動物骨骼。至於農耕和家畜還不大清楚，雖然不排斥當時已有種植芋頭和薯芋的可能性，但還沒有形成栽培穀物的原始農業。這可能是由於熱帶或亞熱帶的氣候利於植物的生長，為採集漁獵經濟提供了豐富的物質來源，同時粗糙的石製工具也不利於開發茂密的森林，這些都必然限制了原始農業的發展，致使這裏的早期新石器還不具備農耕活動。

這一帶的碳-14數據誤差較大，往往早到一萬多年以前，甚至同一遺址的不同樣品也出現很大的差距。這是由於華南石灰岩地區的流水中含有古老的碳酸鹽，以致影響蚌壳的碳-14含量，因而測定的年代偏老。通過最近的實驗表明，這裏水下生長的現代動植物樣品，竟偏老一兩千年⁴³。因而華南（包括東南亞）石灰岩地帶屬於碳-14數值的異常地區，一般不能作為斷代的依據。總之，華南一帶的早期新石器文化不大可能早到一萬多年以前，有的遺址年代可能較晚，如台灣台東八仙洞的碳-14數據便晚到公元前三千年，所出石器全部為打製，不見磨製石器和陶器，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例證⁴⁴。

國外有些人把華南早期新石器文化歸入和平文化，甚至主張它是仰韶文化的前身，這不過是把東南亞作為古代文化的中心，而為所謂「中國文化南來說」拼湊論據，這是很難成立的。華南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具有一定的原始性，但在黃河、長江流域農耕文化的影響下，到了新石器時代中、晚期，農業經濟終於佔了主導的地位。

五、結束語

1949年以來，早期新石器文化的考古發現是一項重要的突破，它為繁榮發達的新石器時代找到了先驅。儘管這些發現不是最早的遺存，有無先陶文化的存在也還不夠明確，不過隨着今後工作的開展，我們相信這些問題是不難獲得解決的。

從考古發現上證實，早在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末葉，黃河流域開始出現細石器傳統，許多以細石器為主體的遺存，反映着採集漁獵經濟的色彩，可能屬於中石器時代。至於中國北部和東北亞一帶，細石器傳統繼續繁榮到新石器時代及其以後，一般缺乏農耕活動的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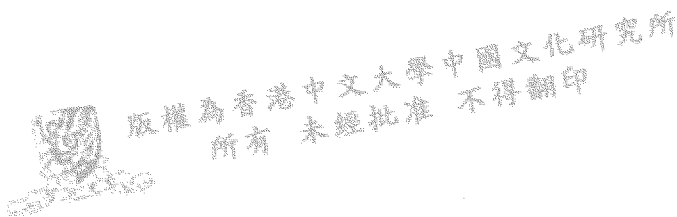
43 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¹⁴C實驗室等：〈石灰岩地區碳-14樣品年代的可靠性與甌皮岩等遺址的年代問題〉，《考古學報》2期，頁243—250，198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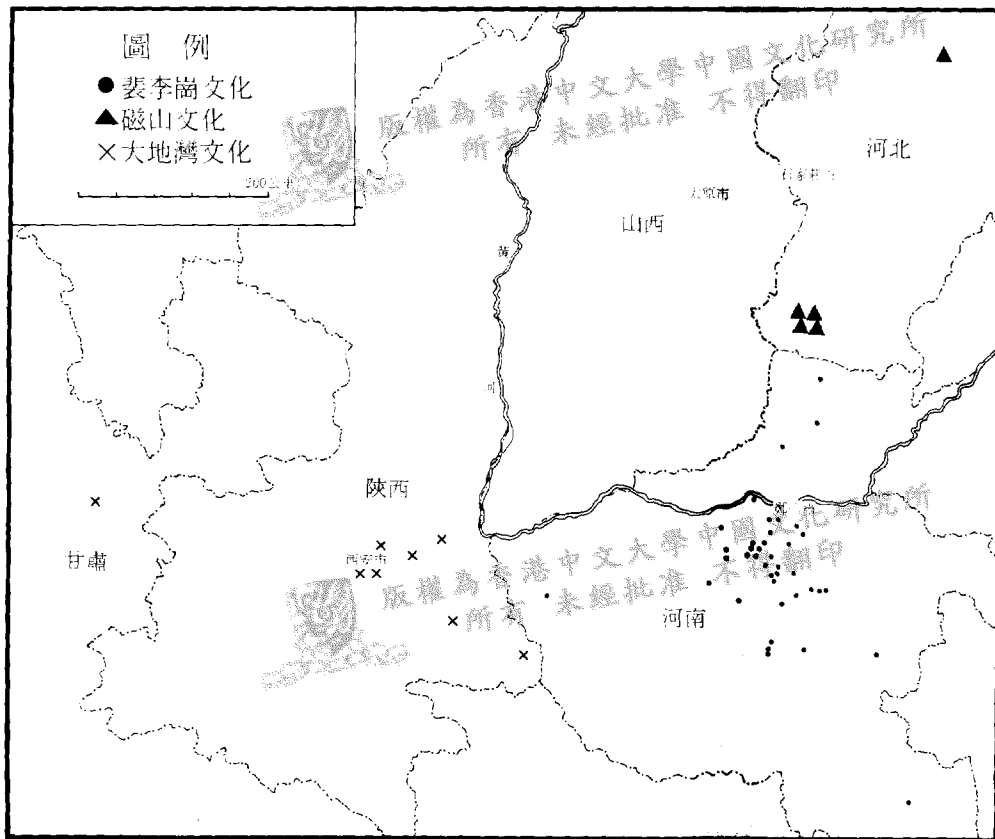
44 宋文薰：《長濱文化（簡報）》，中國民族學會，1969年。

裴李崗文化和大地灣文化都有細石器的殘餘，表明當農業經濟興起之後，細石器傳統在中原地區已趨向於絕迹。內蒙、東北一帶以興隆窪文化為代表的農業聚落，細石器的比例也在顯著減少。這些例證表明，細石器傳統的衰落與農耕的興起有一定的聯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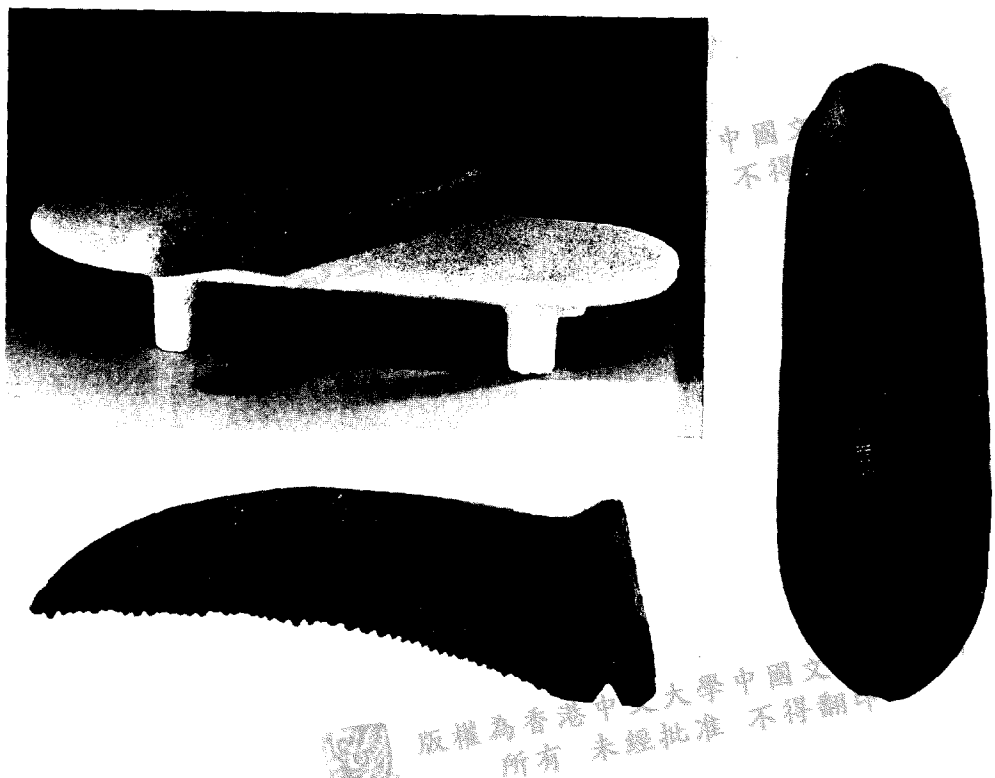
中國史前農業的起源，還是一個未解之謎，但決不是由於外來的影響，像粟、黍一類的耐旱作物，至少距今七八千年以前已栽培於華北的黃土地帶，成為新石器時代到歷史時期的傳統作物。以豬、狗為主的家畜也充分反映這個農業經濟的特色。同時長江下游的作物栽培，也可早到距今六七千年以前，以豬、狗、水牛為代表的家畜，又反映了另具特色的農業經濟。華南的史前農業出現較遲，當然與黃河、長江流域的農耕文化影響有關。中國是世界農業起源中心之一，它與西亞以大麥、小麥和山羊、綿羊為代表的農業經濟屬於不同的範疇。至少在較早的新石器時代，西亞與中國的農業未必有直接的接觸和影響，像中國的小麥出現於青銅器時代，而山羊也只能追溯到龍山文化早期，這都證明它們的輸入較晚。

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和大地灣文化的發現，不僅填補了華北新石器時代研究的空白，還表明它們同後來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是一脈相承的，並直接進入以商周為代表的歷史時期。這種淵源悠久的古老文化傳統，終於奠定了中國古代文明的基礎，並對人類文化的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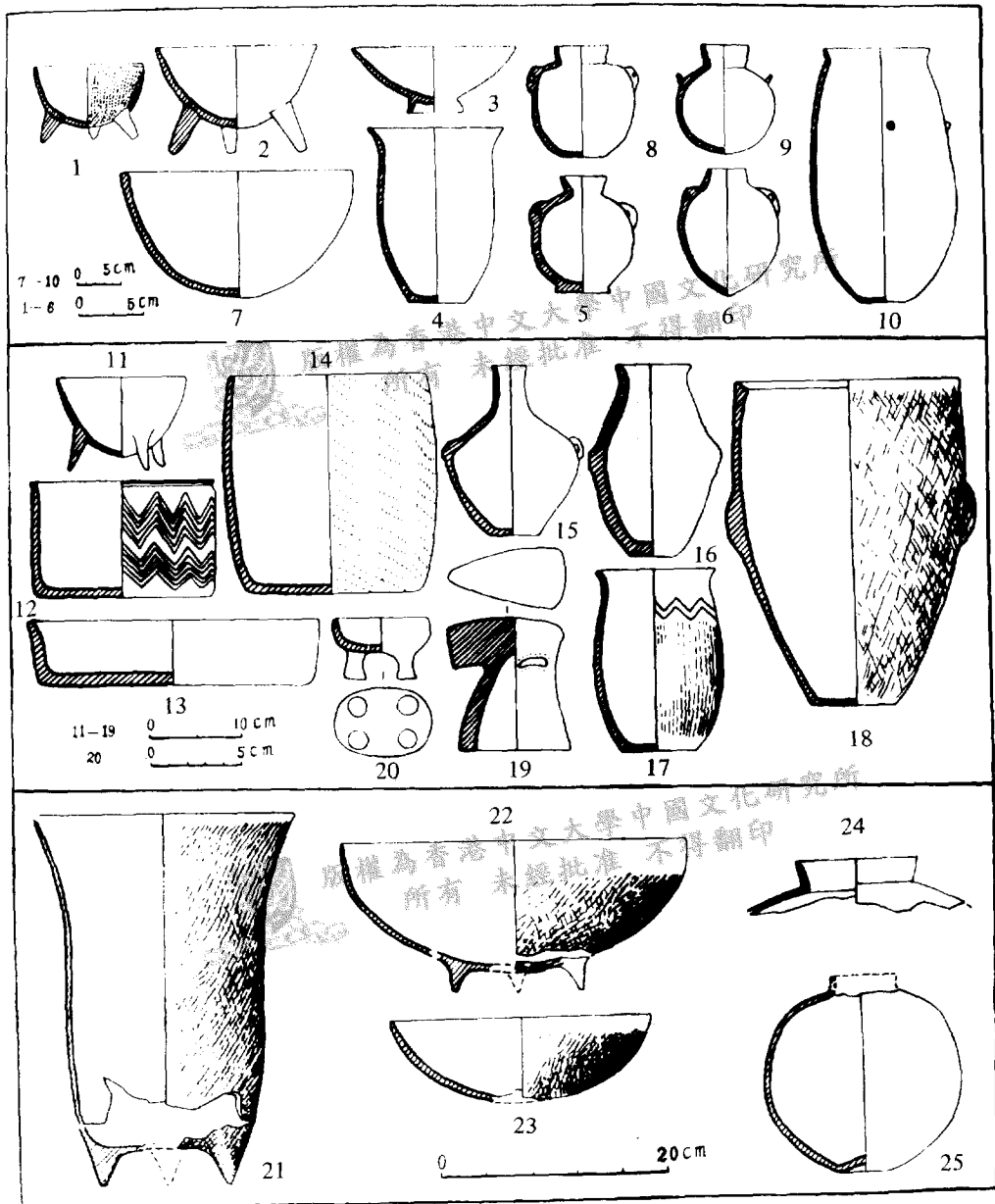


圖一 華北早期新石器文化遺址分佈圖



圖二 裴李崗遺址出土的石器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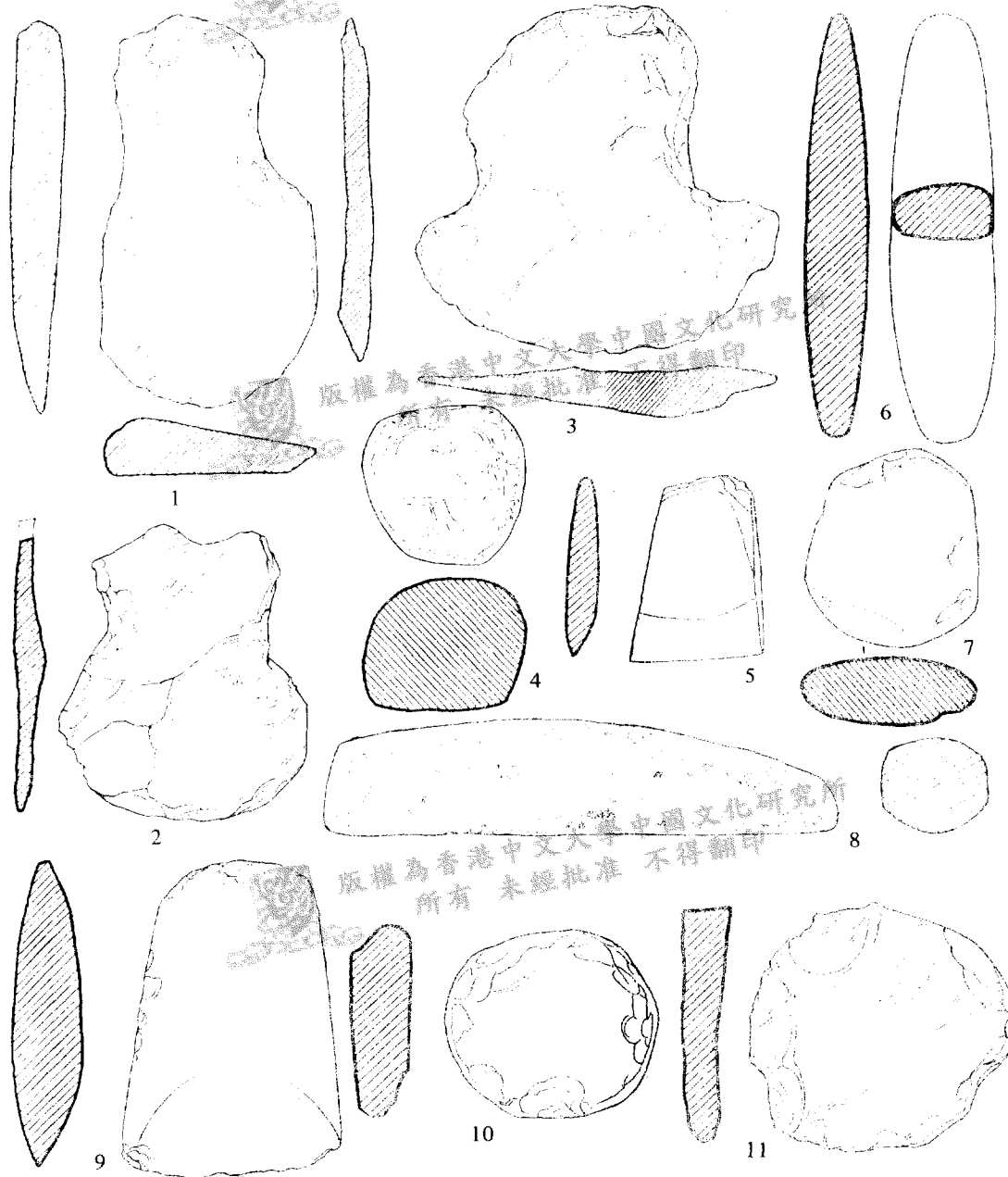


圖三 華北早期新石器文化的陶器

1-10. 裴李崗文化 11-20. 磁山文化
21-25. 大地灣文化(北劉遺址出土)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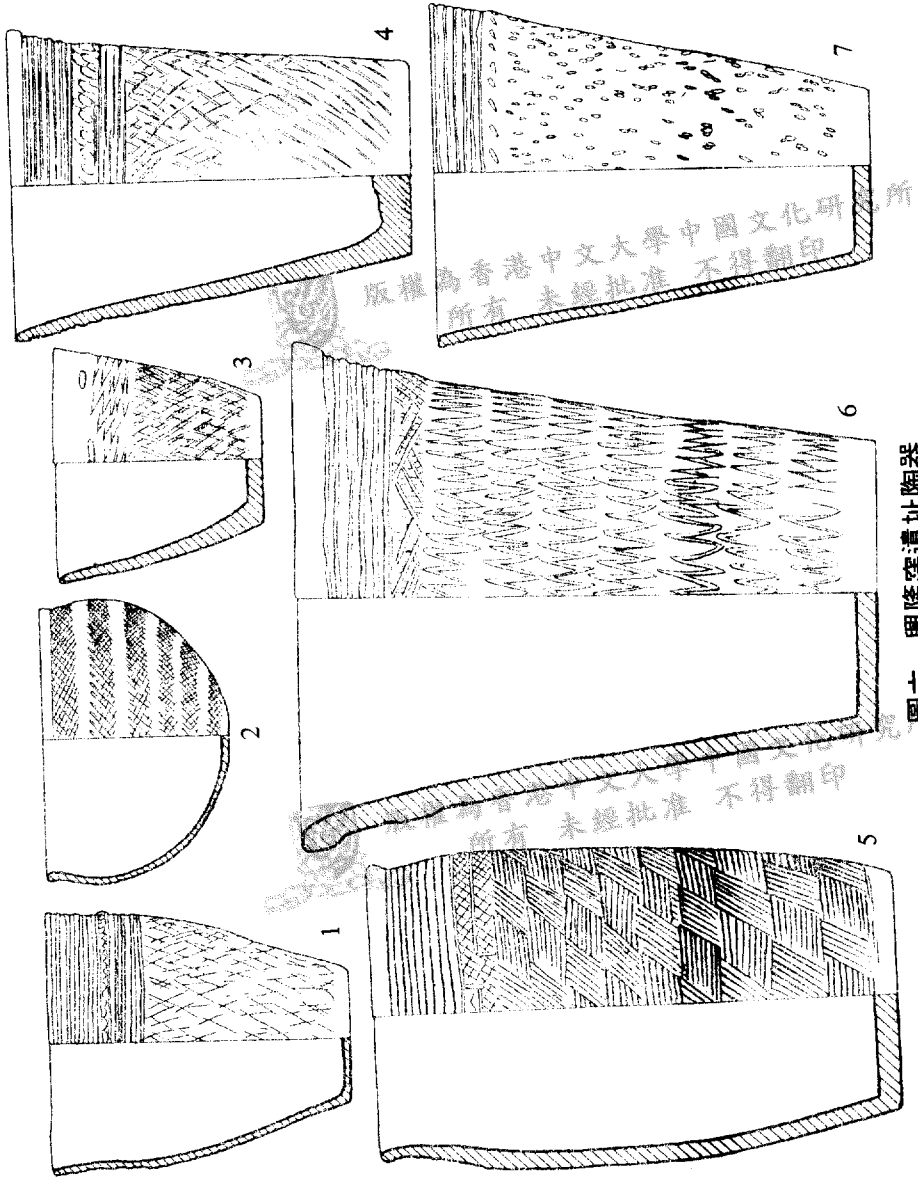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五 興隆窪遺址出土的石器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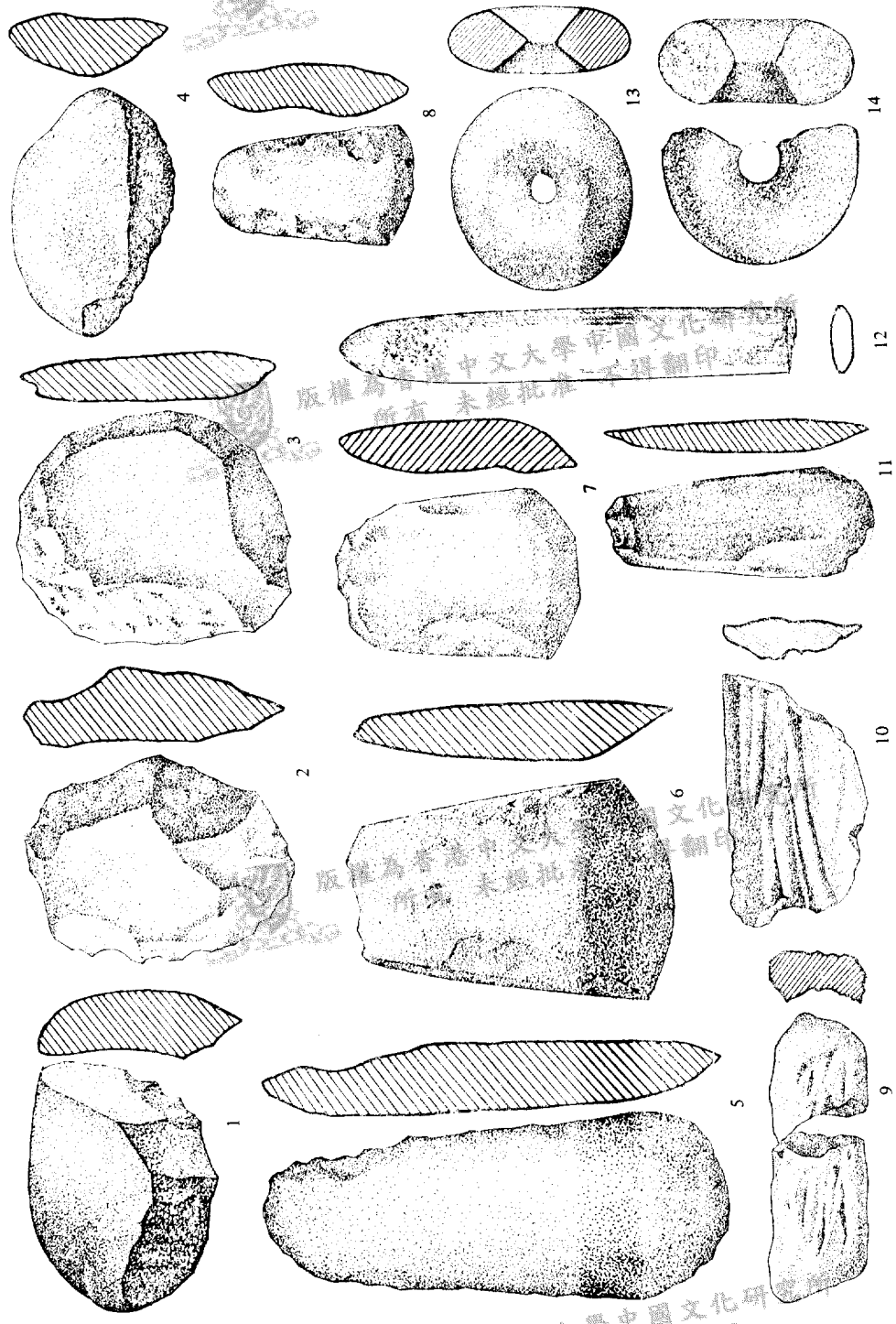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興隆窪遺址陶器 圖六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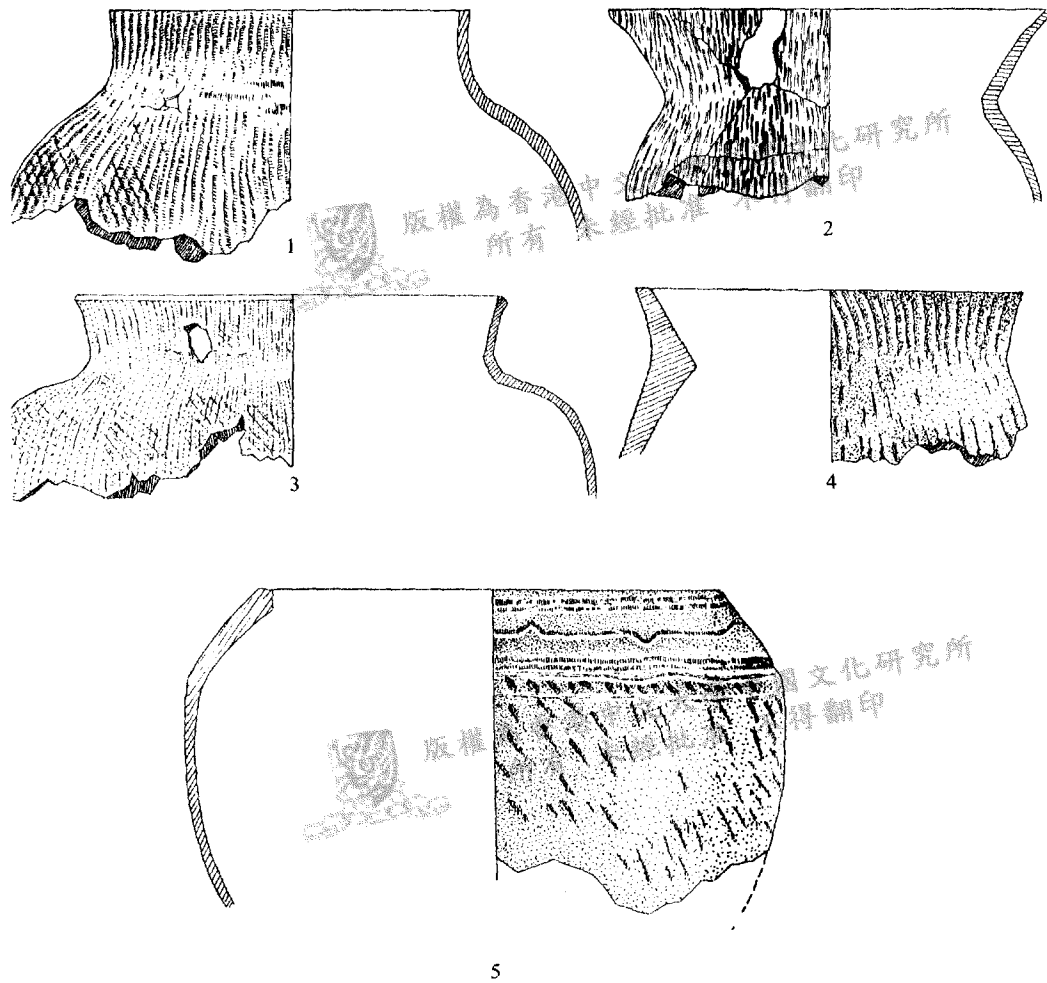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七 甌皮岩出土的石器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八 甌皮岩出土的陶器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On the Early Neolithic Culture of China

(A Summary)

An Zhi-min

The discovery of the Early Neolithic Culture of China fills a gap in history. P'ei-li-kang Culture 裴李崗文化, Ts'u-shan Culture 磁山文化 and Ta-ti-wan Culture 大地灣文化 are the main cultures of Hua-peï 華北. There were already compact communities with millet as their main crop in agriculture. The cultures can be dated back to 6000 B.C. or even earlier. Yang-shao Culture 仰韶文化 and Lung-shan Culture 龍山文化 are the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s of these cultures. The latter also established the found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microlithic culture in the northern grassland had two traditions. One tradition adopted fishing and hunting but lacked any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The other adopted farming and the microlithic component gradually declined. The remains of chipped stone articles and cord pattern pottery in the district of Hua-nan 華南 have no traits of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amongst them either. From the above-mentioned evidence, it is clear that developments varied greatly from district to district.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